

王柏的《诗经》观与拟删诗^{*}

陈战峰

提 要 王柏拟删诗是王柏《诗经》观的折射和必然反映。^①他在“淫诗说”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王柏继承朱熹衣钵,但又不受朱学范围,他的《诗经》学重视诗篇的义理解说,将朱熹的“淫诗”说向前推进了一步,进一步明确了《国风》一些诗篇的民歌性质。王柏拟删诗篇的主张屡受指责,所列拟删诗目中“空白”(或改动)的一首应为《王风·采葛》,体现了比较慎严的学术态度和理学思想。王柏是南宋末年“义理解《诗》”的代表人物,是继朱熹之后对《诗经》学进行总结的又一学者。

关键词 《诗经》 王柏 淫诗说 拟删诗

在《诗经》学史上,宋代王柏将自由立说、疑经改经推至顶点,王柏以后宋代《诗经》学日趋衰落。^②因此,在某种意义上,王柏是宋代《诗经》学史上具有转折作用的学者。尽管在清代,不少经学家指责他妄退圣经,但也难以抹煞他在经学史的重要地位。在《诗经》学上,王柏除对《诗序》的存废、“乐歌”与“徒歌”的关系、《诗经》诗篇残错等有自己的看法之外,还拟删国风诗篇 32 首,但目前所见诗篇仅存诗目 31 首。如果联系王柏的《诗经》学思想,对王柏的拟删诗及其所缺诗题将会有新的认识,同时,也会进一步彰显王柏在宋代《诗经》学中的学术总结作用。

一 王柏的《诗经》观

王柏的《诗经》观主要体现在关于“六经”道体或文道关系的认识上,他在欧阳修等人的学术基础上做了进一步发展。

欧阳修认为“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,道所存也,《诗》关此五者而明圣人之用焉。迹其道不知其用之与夺,犹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圆,是果成乎?”^③欧阳修认

^{*} 本文属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宋代《五经》学与理学关系研究”阶段性成果之一,项目编号为 08XZS006

^① 王柏(1197—1274),字会之,一字仲会,号鲁斋。婺州金华(今浙江金华市)人。康熙年间的纳兰成德(容若)在《王鲁斋《诗疑》序》中,根据《吴礼部正传节录行实》认为王柏的《诗经》学著作主要有《读诗纪》(十卷)、《诗可言》(二十卷)、《诗辨说》(二卷),并认为《诗疑》“殆即《诗辨说》”。《诗疑》,今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丛书集成初编本、顾颉刚先生校点本等。

^② 夏传才: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(增注本),北京: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,第 121 页。

^③ [宋]欧阳修:《诗本义》卷 15《诗解统序》,《四库全书》第 70 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影印文渊阁本,第 294 页下栏。

为《诗经》关乎其他“道”之所存的“五经”，并进一步明“用”，而“迹道”与“知用”紧密结合，尽管欧阳修所说的“用之与夺”主要是指“劝戒”、“美刺”，但实际上已初步纠正了对《诗经》的三种偏见。^①张载认为“圣人文章无定体，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易》、《礼》、《春秋》，只随义理如此而言”，^②就是将“五经”作为表达“义理”的文章体式，而且受“义理”的支配和制约，此处的“义理”显指“道”。洪迈认为“《六经》之道同归，旨意未尝不一，而用字则有不同者”，^③以文道来看待《六经》形式和内容的关系。陆九渊也认为“《六经》之作，本以明道”。^④朱熹主张《诗》的功用，是“使人心无邪”，^⑤“读书以观圣贤之意；因圣贤之意，以观自然之理”，起点与落脚点最终是体认“天地之理”或“自然之理。”^⑥吕祖谦也认为“《诗》三百篇，大要近人情而已”，“看《诗》且须讽咏，此最治心之法。”^⑦杨简从文道关系角度，进一步明确地提出“六经”“文六”而“道一”的观点，“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，其文则六，其道则一”，^⑧“六经”只是形式的不同，而它们所贯穿的思想是相同的，他用“本心”将各经贯通起来，“‘六经’则无所不一，无所不通”，^⑨使“本心”与“道”同一不二，体现了完全的心学的“六经观”和《诗经》观。

在关于“六经”道体或文道关系的认识上，王柏与杨简不谋而合，但侧重点也显而易见，杨简更多强调在“文异”前提下的“道同”，而王柏则更多强调在“道同”基础上的“文异”，这种细微的差别反映了理学影响经典阐释的不同阶段，后者则带有较强的反思意味，因而就有可能突出对典籍特点的研究。

王柏认为《诗》平易，而其他“五经”则支离，“圣人欲以《诗》之平易而救‘五经’之支离，孰知后世反以‘五经’之支离而变《诗》之平易。是殆不然。当三百篇之全时，而‘五经’未尝碎缺；当‘五经’之支离，而《诗》亦未尝平易。是又以后世伤残破裂之经视圣人完全严密之经，又非所以言圣人之时之经也。‘六经’虽同一道而各有体，犹四时均一气而各有用，此皆天理之不容已，虽圣人亦不可得而以意损益之也”，^⑩以道、体分析比较“六经”，认为“‘六经’虽同一道而各有体”，与欧阳修、张载等的观点相承而更加明晰，并以天理统之，体现了宋代理学家对经典关系的基本看法。这里已将“圣人之志”降到次要地位，而突出天理的至上无间，反映了理学的发达和对经典阐释的渗透。

王柏认为“然圣人之《诗》之为教所以异于他经者，自有正说。当周之初，虽有《易》而

① “大抵谓《诗》为不足通者有三：曰章句之书也，曰淫褻之辞也，曰猥细之记也。”（《诗本义》卷15《诗解统序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第70册，第294页下栏）

② [宋]张载：《经学理窟·诗书》，《张载集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78年版，第255页。

③ [宋]洪迈：《容斋随笔·容斋三笔》卷10《六经用字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531页。

④ [宋]陆九渊著，钟哲点校：《陆九渊集》附录1《王宗沐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版，第541页。

⑤ [宋]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23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6年版，第547页。

⑥ [宋]黎靖德编，王星贤点校：《朱子语类》卷10，第162页。

⑦ [宋]吕乔年：《丽泽论说集录》卷3《门人所记诗说拾遗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第703册，第340页下栏。

⑧ [宋]杨简：《慈湖遗书》卷1《诗解序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第1156册，第608页上栏。

⑨ [宋]杨简：《慈湖遗书》卷1《诗解序》，《四库全书》第1156册，第608页下栏。

⑩ [宋]王柏撰，顾颉刚校点：《诗疑》，北京：景山书社1930年版，第60页，标点略作改动。

本之卜筮,虽有《书》而藏之史官,《仪礼》未著,《周官》未颁,麟未出而《春秋》未有兆朕也。周公祖述虞舜命夔典乐之教,于是诏太师教以‘六诗’,是以《诗》之为教最居其先。然其所以为教者,未有训诂传注之可说,不过曰‘此为风’、‘此为雅颂’、‘此为比兴’、‘此为赋’而已,使学之者循‘六义’而歌之,玩味其词意而涵泳其情性,苟片言有得而万理冰融;所以销其念虑之非而节其气质之杂,莫切于此。此《诗》之所以为教者然也”,^①纯以理学思想和观念解释“诗教”的功能。王柏重涵泳、反对因循传注,实际上表达了自己解《诗》的理学立场及对汉学的看法。宋人对“六义”很重视,程子始曰“学《诗》而不分‘六义’,岂能知诗之体”,谢良佐曰“学《诗》须先识六义体面而讽味以得之”,“朱子亦以为‘古今声诗条理无出于此’”,^②王柏探讨周代“循‘六义’而歌之”,^③实是有渊源的。

王柏认为“诗何自而始乎?”尧之时,“出于老人儿童之口”,“冲口而出,转喉而声,皆有自然之音节”;舜时体各不同,夏商以来,格调纷杂,他承袭传统的假托周公整理《诗经》而蕴圣人之志的看法,认为周公“取其声诗义理深长、章句整齐者,定为一体”并“名之曰‘风’”,^④如剥去这一迷雾,则王柏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《诗经》的产生,即由民间歌谣而经有文化的学者整理删汰的历史过程,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,同时也就蕴含着《诗经》起源于民歌的观点。

王柏对待经典的态度,根据“识”以斟酌之,“力”以裁减之,“识不足以破其妄,力不足以排其非”,又说“圣人之道以书而传,亦以书而晦”,^⑤揭示了文与道之间的辩证关系,清代章学诚“文可以明道,亦可以叛道”可视作对此的继承。^⑥

王柏认为“虽后世皆破裂不完之经,而人心有明白不磨之理”,他提出两个解决方案。最上者,“推人心之理以正后世之经”。^⑦其实从欧阳修开始,在据文求义的同时,主张人情古今同一,以人情沟通古今,使经典解释合乎情理。南宋中晚期,理学已经成熟,理高居于万物之上,同时又不离于万物,理以摄心,心以藏情,因此,从学理角度说,王柏“推人心之理以正后世之经”将欧阳修的方法向前推进了一步,使之更加带有鲜明的理学色彩。四库馆臣认为欧阳修开王柏之先河,正是有见于此。^⑧其次者,不能循“破裂不完之经以坏明白不磨之理”。^⑨此时理或道居于主导地位,而经则是记载道或理的符号系统,是形式,如果形式蒙蔽或不利于道或理的传达,则经典的权威性会受到怀疑。所以,这两个学

①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61页,标点略有调整。

②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62页。

③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61页。

④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41页。

⑤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3页。

⑥ [清]章学诚著,叶瑛校注:《文史通义校注》卷2《言公中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94年版,第185页。

⑦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4页。

⑧ 《诗本义·提要》认为:“自唐以来,说《诗》者莫敢议毛郑,虽老师宿儒亦谨守《小序》。至宋而新义日增,旧说几废,推原所始,实发于修。”(《四库全书》第70册,第181页下栏)“后之学者或务立新奇,自矜神解,至于王柏之流乃并疑及圣经,使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俱遭删窜,则变本加厉之过,固不得以滥觞之始归咎于修矣。”(《四库全书》第70册,第182页上栏)。

⑨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4页。

术方法的基本思想依据依然是王柏对文道关系的认识,即前面的“圣人之道,以书而传,亦以书而晦”,它使韩愈等人的“载道”“明道”“本道”的思想变得更富于深度和辩证性,^①如果说韩愈等侧重于从文本功能角度阐述文道关系,王柏则进一步揭示了他们未注意到的另一侧面,即文本也会妨碍道的传达。如果从今天解释学,主要是哲学解释学的角度分析,王柏的这个思想是比较深刻的,解释者与文本的对话有许多桥梁(或切入点),而在理学家看来,则无疑是“理”或“道”了,或者称为“义理”。王柏认为《诗》以义理而存。尽管他将《小雅》具体分为“燕享宾客之乐”与“劳来行役之乐”,^②将《大雅》具体指为“会朝之乐而已”,^③但并没有妨碍他对这些诗篇作义理的解释和阐发。这是我们对王柏《诗经》学研究所反映的学术思想及其内蕴的理学立场的基本分析。

正因为如此,王柏在《诗辨序》中说“非敢妄疑圣人之经也,直欲辨后世之经而已”,^④可见他的目的是通过辩驳和澄清汉唐以来纷纭歧杂的《诗经》解释,以恢复能传“道”的《诗经》的本来面目,所以虽在学术上多受讥讽,但也得到统治者的表彰,清雍正二年(1724)从祀两庑。

王柏继承朱熹,推波助澜,进而提出拟删《诗经》诗篇的主张就是自然而然了。

二 朱学衣钵与拟删诗

王柏为朱熹的三传弟子,朱熹传黄榦,黄榦传何基,何基传王柏。王柏继承朱熹的衣钵比较明显,但并未拘泥朱说。清同治年间,胡凤丹月樵甫在《重刻王鲁斋〈诗疑〉序》中评“王鲁斋先生之学渊源朱子,而说《诗》独与朱子异。朱子所攻驳者《小序》耳,于本经未尝轻置一议也。先生黜陟《风》《雅》,窜易篇次,非惟排诋汉儒,且几几乎欲夺宣圣删定之权而伸其私说,其自信之坚抑何过哉!虽然,读书固贵于善信,尤贵于善疑,使妄挟所疑而蔑视古人之说以为概不足信者,其失也诬;然绝不知疑而抱残守阙甘受古人之愚者,其失也又陋。是书设论新奇,虽不尽归允当,而本其心所独得,发为议论,自成一家”。^⑤

顾颉刚先生评价王柏“惟其笃信朱熹,所以才能用了朱熹的方法作比朱熹进一步的研究。这才是真正研究学问的态度。这才是真正继续大师的工作的态度”。^⑥这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王柏评朱熹《诗集传》与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,在《伐檀》诗中认为“《诗记》说于

① 孔子“言之无文,行而不远”(《左传·襄公二十五年》);刘勰“因文而明道”(《文心雕龙·原道》);韩愈“文以载道”,柳宗元“文者以明道”(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),范仲淹“经以明道,文以通理”(《易义》),孙复“文者道之用也,道者文之本也”(《孙明复小集·答张诒书》),周敦颐“文所以载道也”(《通书·文辞》),朱熹“道者文之根本,文者道之枝叶”(《朱子语类辑略》)等,大多是在文道结合的基础上突出道的重要和地位。

②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43页。

③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43—44页。

④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5页。

⑤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73—74页。

⑥ 顾颉刚:《诗疑·序》,见王柏:《诗疑》,第24页。

《序》为近,《诗传》说于理为高,但未有以必其诗之果何如也”^①评吕朱短长,能显示自己的学术偏好。他高度赞扬《诗传》,“《诗传》之释名义,精矣;其释草木虫鱼也密矣”。^②但又未完全恪守朱说,如解《将仲子》,“序者固妄矣,而莆田郑氏谓此实淫奔之诗,而朱子从之,愚谓其有所未尽也。此乃淫奔改行之诗也”。^③王柏评朱熹“退黜《小序》,删夷缠绕”而作的《诗集传》“一旦洗出本义,明白简直,可谓骏功,无复遗憾”。^④

四库馆臣认为王柏《诗疑》“攻驳毛、郑不已,并本经而攻驳之;攻驳本经不已,又并本经而删削之”;^⑤皮锡瑞因而指责“《诗疑》删《郑》、《卫》,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亦任意改易;可谓无忌惮矣。……经学至斯,可云一厄”,^⑥虽然都带有汉学家的门户之见,但也足见《诗疑》所引起的影响之巨。

历史上对王柏争议最大的是删削《诗经》和进退圣人问题,纳兰成德(容若)评王柏删退诗篇,如将《二南》中的《野有死麇》、《何彼秣矣》、《甘棠》等归于《王风》,“此则汉唐以来群儒莫之敢为者也”,^⑦侧重进退诗篇。至于删削诗篇,顾颉刚先生认为“仅有这一个拟议而已,否则这几十篇古诗已不会再见之于《诗经》了!”^⑧王柏曾说“愚敢记其目以俟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,一洗千古之芜秽云”,^⑨这是符合实际的,而王柏之后直至当代学者却多有误解。

针对朱熹和吕祖谦关于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(郑卫之诗)性质的争论,王柏认为:

窃意夫子已删去之诗容有存于闾巷浮薄者之口。盖雅奥难识,淫俚易传。汉儒病其亡逸,妄取而搀杂,以足三百篇之数,愚不能保其无也。不然,则不奈圣人“放郑声”之一语终不可磨灭,且又复言其所以放之之意,曰“郑声淫”,又曰“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”。愚是以敢谓淫奔之诗,圣人之所必削,决不存于雅乐也审矣。妄意以刺淫乱,如《新台》、《墙有茨》之类凡十篇,犹可以存之,惩创人之逸志;若男女自相悦之词,如《桑中》、《溱洧》之类,悉削之以遵圣人之至戒,无可疑者。所去者亦不过三十有二篇,使不得滓秽《雅》、《颂》,殽(淆)乱《二南》,初不害其为全经也。如此,则二先生之疑亦俱释矣。

若淫奔之诗,不待智者而能知其为恶行也,虽闾巷小夫亦莫不丑之,但欲动情盛,自不能制尔;非有疑似难明,必待存其迹而后知。今夫童子淳质未漓,情欲未开,或于诵习讲说之中,反有以导其邪思,非所以为训。且学者吟哦其丑恶于唇齿间,尤非雅尚。读书而不

①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13页。按:“《诗记》”、“《诗传》”分别指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(丛书集成初编本,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)和朱熹《诗集传》(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)。

②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17页。

③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10页。

④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8页。

⑤ 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7,《经部》17,《诗类存目一·诗疑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97年版,第216页。

⑥ [清]皮锡瑞著,周予同注释:《经学历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4年版,第190页。

⑦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68页。

⑧ 顾颉刚《诗疑·序》,见王柏:《诗疑》第2页。

⑨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28页。

读淫诗,未为缺典。^①

王柏协调朱吕,试图通过删削诗篇的办法恢复《诗经》所谓“无邪”的原貌,甚至认为“读书而不读淫诗,未为缺典”,这和王柏对待《诗经》的态度有关。但是毕竟朱熹和吕祖谦某些具体的《诗经》学观点出入很大,主要集中在对《小序》的态度,特别是对“淫诗”及“郑卫之声”的认定上,王柏拟删32首(实为31首)“淫诗”,直接的推动力即是“协调朱吕二公”异同。

王柏本着对“孔子删诗”、“诗教”和朱熹“淫诗说”的笃信,认定今本《诗经》中的“淫诗”为汉儒窜入,并据此将《诗》的变化分为三个阶段:“《诗》凡三变矣。《正风》,《正雅》,周公时之诗也。周公之后,《雅》,《颂》庞杂,一变也。夫子自卫反(返)鲁,然后乐正,再变也。秦火之后,诸儒各出所记者,三变也”。^②在他看来,同遭秦焚之祸,《书》亡佚错乱不堪而《诗》保存完整似旧,“《诗》《书》同祸而存亡之异辽绝乃如此,吾斯之未能信”。^③同时,他又坚信朱熹对部分诗篇的“淫诗”性质认定,“自朱子黜《小序》,始求之于诗,而直指曰此为淫奔之诗。予尝反覆(复)玩味,信其为断断不可易之论。律以圣人之法,当放无疑”,^④并自觉生朱子后有重新整理《诗经》典籍的责任,“在朱子前,《诗》说未明,自不当放。生朱子后,《诗》说既明,不可不放。与其遵汉儒之谬说,岂若遵圣人之大训乎!”^⑤

在这种情况下,王柏拟删诗歌32篇,但今之《诗疑》目录只有31篇,似后又改动一篇。

三 王柏拟删而重改的一首诗篇目考

王柏拟删的诗篇总共32篇,而所列篇目只有31篇,略有出入。兹据中华书局1985年版丛书集成初编本《诗疑》所制目录形式抄录如下(只将竖排改为横排):

野有死麇召南	静女邶	桑中鄘
氓	有狐并卫风	
丘中有麻王	将仲子	遵大路
有女同车	山有扶苏	箜篌
狡童	褰裳	东门之墉
丰	风雨	子衿
野有蔓草	溱洧郑风	大车王
晨风秦	东方之日齐	绸缪
葛生唐	东门之池	东门之枌
东门之杨	防有鹊巢	月出
株林	泽陂并陈风	

①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28页。按:“閭巷”的“巷”、“欲动情盛”的“盛”、“必待存其家而后知”的“家”,丛书集成初编本分别作“閭”、“胜”、“迹”。

②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26页。

③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7页。

④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2页。

⑤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2页。

另一篇到底是怎么回事,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呢?《四库全书总目》认为“疑传刻者脱其一篇”,^①当今学者夏传才认为当系版刻错误,檀作文以为两数字“必有一误”,郝桂敏则认为不值得深究。^②而事实上未必如此简单,在这个欲删又未删的变化中能反映出王柏的思想和治学态度。所以应首先清理出这后来未列入名单诗篇的名称。

洪湛侯先生根据诗歌目录“所缺空格在全文当中,即第二行下端”推测“当为作者写成以后,自觉未妥,又重新抹去留下的痕迹”,^③是很有道理的。他猜想改动的这首诗在《木瓜》、《扬之水》、《采葛》、《叔于田》四篇中,根据王柏的认识,先排除掉《叔于田》和《扬之水》,《木瓜》、《采葛》二诗“为淫奔,而情款未明”(《诗疑》卷一),洪先生虽没有给以明确结论,但在此基础上却意味深长地说“王柏在《诗疑》中亦从未指《木瓜》为淫诗”,^④或许是倾向于《木瓜》诗了;如果将此句理解为也可将《木瓜》排除出去,那么就指向了《采葛》,洪先生未作明示,但显而易见论据不足。

顾颉刚先生校点本《诗疑》未追究此问题,而且他制的目录形式掩盖了两点,即所删诗篇的具体位置和因按《国风》体例合并诗篇而改动了原有目录的面貌,^⑤使这种考察的线索变得模糊了。但《四库全书》文渊阁本和丛书集成初编本保留着这个格式:第一,在《有狐》(并《卫风》)下与上行《桑中》(《鄘》)并列有一空格,这是被删诗目的准确位置,紧接这个空格下行第一首为《丘中有麻》(《王》),说明很有可能被删诗在“三卫”诗(鄘、卫)与《王风》中,根据前边“并《卫风》”字眼判断,表面似为《王风》的可能性最大;第二,在《溱洧》(《郑风》)与下行《晨风》(《秦》)之间窜有一条《大车》(《王》),说明《王风》中的两首诗未同时考虑,同时说明这个目录整体上有严格国别顺序,但也有例外。

这两点很有价值,有助于缩小范围,但还不能明确地指定诗篇名目。如果注意到这个目录后王柏的解说也许会发现解决此问题的关键:

盖序者于此三十余诗,多曰“刺时也”,或曰“刺乱也”,曰“刺周大夫也”,“刺庄公”,“刺康公”,“刺忽”,“刺衰”,“刺晋乱”,“刺好色”,“刺学校废”,亦曰“刺奔也”,“止奔也”,“恶无礼也”,否则曰“忧谗也”,“惧谗也”,或曰“思遇时也”,“思见君子也”,未尝指为淫诗也。^⑥

涉及十七项《诗序》的评价,我们试让其一一对应于各自的诗篇,竭泽而渔,则被掩盖者不难水落石出。详见表1。

表1《王柏拟删诗篇与《诗序》评价对照简表》中,《诗序》“思见君子也”没有完全对应的项目,但有与之意义相同、表述形式几乎一致的“思君子也”对应的两首诗篇,同时在“三卫”诗与《王风》中也没有这样的表述,因此此条不予考虑。所以在这个表中出现的删掉的诗篇就可能是所谓“止奔也”的《鄘风·蟋蟀》或所谓“惧谗也”的《王风·采葛》。结合

① 《钦定四库全书总目》卷17,《经部》17,《诗类存目一·诗疑》,第216页。

② 夏说见其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(增注本)第121页,檀说见其《朱熹诗经学研究》(北京: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)第101页,郝说见其《宋代〈诗经〉文献研究》(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)第124页。

③ 洪湛侯:《诗经学史》,北京:中华书局2002年版,第392页。

④ 洪湛侯:《诗经学史》,第392页。

⑤ 夏传才《诗经研究史概要》(增注本)也是如此。

⑥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32页。

前文目录的格式暗示的两点,《邶风·蟋蟀》的可能性很小;从内容角度分析,《邶风·蟋蟀》,《诗序》、程颐、朱熹等皆未认作“淫诗”而是“刺诗”,因第三人称很明显,不是抒情主人公自道,不符合“淫者自道”的标准。但是因为它所涉及的对象是“淫奔”,因此由前面王柏“止奔也”的解说可以证明他曾经考虑过将其列入目录。《王风·采葛》,原为朱熹认定的“淫诗”,“盖淫奔者托以行也”。^①王柏删淫诗是在朱熹淫诗的基础上增删而成的。在朱熹认定的28首诗中,王柏削去了《卫风·木瓜》、《王风·采葛》、《郑风·扬之水》,而补入了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、《卫风·有狐》、《秦风·晨风》、《唐风·绸缪》、《唐风·葛生》、《陈风·株林》。^②根据这里的统计和分析,王柏在删去《王风·采葛》时很犹豫,也说明比较慎重。这是极为明智的学术态度。据今人程俊英、蒋见元二先生研究,《采葛》“是一首思念情人的诗。这位情人可能是一位采集植物的姑娘,因为采葛织夏布。采葛供祭祀,采艾以疗疾,这些在当时都是女子的工作”,“朱熹纠正《毛序》的错误,认为这是思念情人的诗,并将第一句改标为赋”,^③但是他却又将这位被思念的情人说成是‘淫奔者’,姚际恒斥之为‘尤可恨’,实在有道理”,^④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王柏也是比较合适的。

表1 王柏拟删诗篇与《诗序》评价对照简表

	诗篇名称	小计 (含备注)	备注	总计
刺时也	《邶·静女》、《卫·氓》、《卫·有狐》、《陈·东门之池》、《陈·东门之杨》、《陈·泽陂》	6		
刺乱也	《郑·东门之墉》、《郑·丰》、《郑·溱洧》	3 + 1	“疾乱也”:《陈·东门之粉》	
刺周大夫也	《王·大车》	1		
刺庄公	《郑·将仲子》	1		
刺康公	《秦·晨风》	1		
刺忽	《郑·有女同车》、《郑·山有扶苏》、《郑·箜兮》、《郑·狡童》	4		
刺衰	《齐·东方之日》	1		
刺晋乱	《唐·绸缪》	1 + 1	“刺晋献公”:《唐·葛生》	
刺好色	《陈·月出》	1 + 1	“刺灵公也”:《陈·株林》	
刺学校废	《郑·子衿》	1		
刺奔也	《邶·桑中》	1		
止奔也		0	说明:此为《邶·蟋蟀》。	
恶无礼也	《召南·野有死麇》	1		
忧谗也	《陈·防有鹊巢》	1		
惧谗也		0	说明:此为《王·采葛》。	
思遇时也	《郑·野有蔓草》	1 + 2	“思贤也”:《王·丘中有麻》;“思见正也”:《郑·褰裳》	
思见君子也		0 + 2	“思君子也”:《郑·遵大路》、《郑·风雨》	

因此,整体而言,王柏后来删掉的这一首诗目应为《王风·采葛》。“32”和“31”之间实

① [宋]朱熹:《诗集传》卷4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,第46页。
② 参见檀作文:《朱熹诗经学研究》,第90—91页,第101页。
③ 《诗序》作“兴”。
④ 程俊英、蒋见元:《诗经注析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91年版,第211页。

际蕴藏着丰富的学术信息。至于《大车》何故窜入《郑风》与《秦风》之间,个中详情不能臆断,故阙疑。

四 王柏拟删诗与“淫诗说”

《国风》中的一些诗篇描写了男女相互咏歌赠答、表露心迹、私约期会的情景,因为这些举动不符合后来社会的一般伦理规范而被打上“淫奔”的烙印,汉唐学者便以“刺淫”来对待这些诗歌,可以称为“刺诗说”。至宋代,这些诗篇由“刺淫”而变为“淫者自道”,成为所谓的“淫诗”,这种说法可以称为“淫诗说”。

“淫诗说”成熟于朱熹,也以朱熹影响最大,但在朱熹之前已经有了根苗,而各家溯源不同。关于“淫诗说”的起源,《诗经》学学术史上主要有三种认识:一是起源于郑樵,如周孚、朱熹,侧重的是“淫诗说”的影响和事实;一是起源于欧阳修,如《四库全书》的编者,侧重研究方法的继承;一是起源于《毛诗》,如范家相,他指出《毛诗》解诗增加了不少时代因素、私奔情景,为后代郑樵、朱熹、王柏等所本。

“淫诗说”实起于欧阳修,苏辙继承,至郑樵、朱熹大明,王柏进而增益。欧阳修开创了“淫诗”之说。《静女》“乃是述卫风俗,男女淫奔之诗尔”,^①批评毛郑认为“美诗”的见解——“毛郑乃谓正静之女自防如城隅”的“臆说”。^②又如《齐风·东方之日》“在我室兮,履我即兮”者,相邀以奔之辞也。此述男女淫风,但知称其美色以相夸荣,而不顾礼义,所谓不能以礼化也。下章之义亦然”,^③将《陈风·东门之枌》也视为“淫诗”。而这几首诗都在王柏议删的目录中。苏辙也认为《氓》“皆男女相从之辞,后四章皆女见弃而自悔之辞。……托买丝而就之,谋为淫乱也”,^④朱熹、王柏将这首诗归为“淫诗”,实际上正肇始于苏辙。有些“淫奔”之诗,苏辙却曲为解说,如《大车》,^⑤但后终未逃出王柏议删的淫诗目录。

“淫诗说”的具体提出和古代学者对“郑声淫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的理解直接相关,朱熹将“郑声淫”解为“郑诗淫”,是“淫诗说”产生至关重要的一步。到底是“郑声淫”还是“郑诗淫”,历来争论不休。

针对朱熹“淫诗说”,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与学术态度。一是以王柏为代表,如前所述,王柏《诗疑》将朱熹的“淫诗说”推到极致,在 28 首淫诗的基础上作了部分调整,增至 32 首(实只有 31 首),并提出删除这些诗篇的设想和主张,而不致使人误解《诗经》本身,甚至王柏认为生于朱子之后,在朱子将“淫诗”的本来面目揭示出来的情况下,删“淫诗”而使《诗经》复至纯正无瑕就更为必要迫切。一是以马端临为代表,意在廓清朱子“淫诗”

① [宋]欧阳修:《诗本义》卷 3《静女》,《四库全书》第 70 册,第 198 页上栏。

② [宋]欧阳修:《诗本义》卷 3《静女》,《四库全书》第 70 册,第 197 页下栏。

③ [宋]欧阳修:《诗本义》卷 4《东方之日》,《四库全书》第 70 册,第 208 页上至下栏。“下章”指“东方之日”。

④ [宋]苏辙:《苏氏诗集传》卷 3《氓》,《四库全书》第 70 册,第 347 页上栏。

⑤ [宋]苏辙:《苏氏诗集传》卷 4《大车》,《四库全书》第 70 册,第 354 页上栏。

说的负面影响,①主张十五《国风》之《诗序》尤不可废。②他针对朱子立论,辩之极尽酣畅,隐湖毛晋也说“若石林、东莱诸君子,无不叹其深解旨趣,而辩论之快,莫如鄱阳马氏云”③,说见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经籍考》。这两种表面截然相反的学术态度与做法,实质皆是为了维护《诗经》的纯正品质和经学地位,这是饶有趣味的。

王柏根据自己对汉儒“妄取而搀杂,以足三百篇之数”而使《诗经》全而不全的认识,提出删削以复《诗经》的本来面目,这种提议颇受《四库全书总目》等的批评,皮锡瑞也指出“宋人疑经,至王柏而猖狂已极,妄删《国风》,进退孔子”。④王柏将“郑声淫”理解为“郑诗淫”,“记其目以俟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,一洗千古之芜秽云”。⑤“放郑声”(《论语·卫灵公》)起源较早,各代学者有不少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,有些就侧重礼法角度(《论语集注》卷八)。而“放淫诗”的主张,则以王柏为始。

王柏衡量“淫诗”的标准是“发乎情,止乎礼义”,并未超出汉代学者的眼光。王柏反对“郑卫之音并称”的说法,认为“郑声”远较“卫声”淫冶,三卫之诗共39首,“淫诗”4首,“刺诗”6首,而郑诗21篇中,“淫诗”居16篇,其中一半作于淫女。⑥

王柏的学术观点对宋元时金履祥、许谦、宋濂等人影响很大,⑦明清学者程敏政、茅坤、阎若璩等也深信王柏观点。⑧

总之,王柏拟删诗是王柏《诗经》观的折射和必然反映。他在“淫诗说”的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。王柏继承朱熹衣钵,但又不受朱学范围,他的《诗经》学重视诗篇的义理解说,将朱熹的“淫诗”说向前推进了一步,进一步明确了《国风》一些诗篇的民歌性质。王柏拟删诗篇的主张屡受指责,所列拟删诗目中“空白”(或改动)的一首应为《王风·采葛》,体现了比较谨严的学术态度和理学思想。王柏是南宋末年“义理解《诗》”的代表人物,是继朱熹之后对《诗经》学进行总结的又一学者。

(作者通讯地址:陈战峰 西安 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 710069)

(责任编辑 晓 思)

① 这种影响客观上的确存在。据清代毛奇龄《白鹭洲主客说诗》载:“宋黎立武作《经论》,少时读箕子《禾黍歌》(《麦秀歌》),恸焉流涕。稍长,读《郑风·狡童》诗,而淫心生焉。出而视邻人之妇,皆若目挑心招,怪而自省。夫犹是‘彼狡童兮,不与我好兮’二语,一读之而生忠心、一读之而生淫心者,岂其诗有二乎?解之者之故也。然则解诗当慎矣。”(参见陈子展撰述《诗经直解》,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,第264页)。

② [汉]毛萇传述,[宋]朱熹辨说《诗序》丛书集成初编本,北京: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,第50页。

③ [汉]毛萇传述,[宋]朱熹辨说《诗序》第60页。按“无不叹其深解旨趣”的“其”指《毛诗序》。

④ [清]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2《诗经·论诗》比他经尤难明其难明者有八,北京:中华书局1954年版,第2页。

⑤ [宋]王柏撰,顾颉刚校点:《诗疑》,第28页。

⑥ 王柏《诗疑》(第6页):“卫之诗淫奔者固多,而贤妇人之诗亦不少。前有庄姜四诗,后有《柏舟》、《载驰》、《竹竿》、《河广》,以至《泉水》、《雄雉》,皆‘发乎情,止乎礼义’者之诗也。”按“庄姜四诗”指《绿衣》、《终风》、《燕燕》、《日月》。《诗疑》(第12页):“后世淫奔之诗,如《静女》、《桑中》、《氓蚩》、《有狐》四篇而已。刺诗,如《邶有苦叶》、《新台》、《墙有茨》、《君子偕老》、《鶉之奔奔》、《蟋蟀》六篇尔。郑诗二十一篇,而淫奔者十六,其间作于淫女者半之。”

⑦ 《宋元学案》卷82《北山四先生学案》,北京:中华书局1986年版,第2751—2800页。

⑧ [清]皮锡瑞:《经学通论》2《诗经·论三百篇为全经不可增删改窜》,第60—61页。